

邹衍与阴阳学说

卫绍生

“阴阳”一词最早出自《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等说法，让人们对于阴阳有了初步的认识。它和“道”、“神”等抽象概念紧密相连，毫无疑问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或者说属于抽象的理论或理念；“五行”之说最早见于《尚书·洪范》，为洪范九畴之首，所谓“初一曰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这五种构成世间万事万物的基本要素，它同样是对社会与自然的一种抽象概括。到了战国时期，邹衍、邹奭总结此前出现的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将阴阳与五行合而为一，创立了阴阳学派，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具影响的学说之一。

根据东汉史学家班固的说法，阴阳家不仅渊源有自，而且大有来头，认为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传说尧即位之后，命令大臣羲和按照日月星辰的运转规律，制定历法，传授给老百姓，让老百姓根据历法安排生产和生活。既然是制定历法、敬授民时，就必然会有时间与事件的适宜与禁忌，某件事情什么时间可以做，什么时间不可以做，都有所规定。譬如，春天阴气下降，阳气上升，天气转暖，适宜播种；夏天阳气正盛，天气炎热，适宜万物生长；秋天阳气下降，阴气上升，天气转冷，适宜收割；冬天阴气正盛，天气寒冷，适宜冬藏。春播、夏长、秋收、冬藏，一切都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进行，只需按照节令去做就可以了。到了战国时期，邹衍、邹奭把这种“敬授民时”的阴阳学说和诸侯争霸结合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取合诸侯”的理论。

一般以为，邹衍和邹奭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但事实

上，邹衍和邹奭经历不同，学说也有所不同。邹衍生活于齐威王和齐宣王年间，曾经在稷下学宫讲学，宣扬他的阴阳五行思想。他还游于燕、赵，受到隆重的礼遇。他的学说气势宏大，偏重于探讨天道和社会运行规律，故被称为“谈天衍”；邹奭是齐国“三邹”最小的一个，他的学说着眼于细微之事，偏重于微观，故被称为“雕龙奭”。二人的学说，一重宏观，一重微观，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成就了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派——阴阳学派。他们依据阴阳运行变化和五行的生克关系来推论社会治乱和历史变化，把社会和历史的变革归之于阴阳五行的生克变化，在百家争鸣的时代独树一帜。

如同阴阳学派始终给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之感一样，邹衍也是一个若隐若现、若虚若实的人物，一个缥缈无际、充满神秘感的人物。邹衍不像孔子、孟子那样为后人所景仰，也不像老子、庄子那样名震百代，但他在战国诸子中的地位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样，也是开山立派的人物，是诸子百家中的翘楚，而且，在当时，他远比孔子、孟子、庄子等人要风光得多。

邹衍是邹国人，和孟子是老乡，生活年代约略与孟子同时或稍后一点，但他在列国所受到的礼遇却远在孟子之上。他在齐国时，受到齐国君臣的高度重视，虽然不至于像前辈邹忌那样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享封侯之荣耀，但也是名重当时。至于在齐国之外，邹衍受到的礼遇就更加隆重了。有三事为证。

其一，梁惠王以国君之尊，听说邹衍要到梁国来，亲自出城到郊外迎接。司马迁叙及此事时说：“（邹衍）适梁，（梁）惠王郊迎，执宾主之礼。”古制，都城百里之外为“郊”，后来把城邑之外泛称为“郊”。“郊迎”是一种十分隆重的礼遇，只有接待上宾时才有。如此隆重的礼遇，孟子何尝有机会享受？

其二，邹衍到赵国，平原君赵胜“侧行避席”。平原君出身于赵国贵族，是当时鼎鼎有名的人物，与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并称“战国四君子”，以善于养士而闻名于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赵国见到邹衍，却是行不中道，席不入主位，小心翼翼，恭敬至极。

第三件事就更是孟子不能企及的了。燕昭王修筑黄金台，礼聘天下才俊。邹衍得知这个消息，自齐而入。燕昭王不仅亲自前往迎接，还“拥彗先驱”，手持一把扫帚，在前面开道，见路上有不洁之物，即亲自扫除之。人们常用“礼贤下士”来称赞那些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人，燕昭王为邹衍“拥彗先驱”，岂止是“礼贤下士”，简直是奉若神明了！燕昭王拜邹衍为师，执弟子之礼，还为他修筑了碣石宫，亲自前往碣石宫中听邹衍讲解阴阳之学。邹衍在碣石宫写出了他的第三部著作《主运》。

邹衍和同时代有社会良知的学人、有意改变纷乱世象的政治家一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目睹当时各国君主奢侈无度，穷兵黩武，不修道德，不恤百姓，自然是痛心疾首。他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挽世道于危卵，救百姓于水火。他游说诸侯，和孔子、孟子一样，也是想把自己那一套治理天下的学说推销出去。他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并且曾以帝王师的身份在燕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世道如此，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明白这个道理，邹衍就在游说诸侯的同时，注意观察阴阳消息之理、世事变化之由，试图找到阴阳消息、世事变化的规律，进而整治世事乱象，消除奢华之风。他创立了属于自己的取合诸侯的学说，先后写下了《终始》、《大圣》和《主运》三部著作，其中《终始》一书被后人称为阴阳学派的奠基之作。

邹衍的三部著作都已经失传了。这是邹衍的不幸，也是中国文化的的天幸。对这三部书的基本面貌，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窥知一二，知道它们大体有这么三个特点。其一是“其语阔大不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好说大话，却缺少证据，经不起推敲；其二是“因载其视祥度制，推而远之”，就是把各种异常事变作为推论社会治乱盛衰的表征；其三是把“五德终始”视为社会变革、朝代更迭的一般规律，所谓“五德转移，治各有宜”。依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些理论即使不是荒诞不经，也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邹衍所说的各种现象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无法证伪或证实的东西，是最令人琢磨不透的。

往事越千年，邹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今天已经无法复原了。我们只能从前人点点滴滴的介绍中，对邹衍其人其事作一粗略描述。而且，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东西，有时还相互抵牾，相互矛盾，令

人难辨真伪。譬如 邹衍和公孙龙之辩 就有人怀疑其真实性。

有一种说法是，邹衍在赵国的时候，曾在平原君赵胜府与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进行过辩论。公孙龙是有名的辩士，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辩题“白马非马”。邹衍也很善于辩论。平原君想看一看两个能言善辩的人究竟谁更胜一筹，让邹衍就“白马非马”这一辩题和公孙龙辩论一番。

邹衍是何等人！面对以善辩著称的公孙龙，他不是被公孙龙牵着鼻子走，陷入那无休无止的逻辑争论中，而是高屋建瓴，以一种俯视群僚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和公孙龙对话。他对平原君说，没有必要和公孙龙辩论什么“白马非马”的问题，那是不值得一辩的。辩论的目的是要区别不同类型的事物，使它们不至于相互抵牾，相互冲突，是要把不一样的东西条理化，而不是让它们杂乱无章。通过辩论，应该让人们明白，哪些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各有什么用途和价值。论辩双方最后不论是胜是败，都会各有所得，胜者不失其所守之道理，败者也能从中得到他所得到的。在他看来，这样的辩论才是有价值的。至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花里胡哨，而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的命题，或是在华丽言辞掩饰之下的假命题、伪命题，或是偷换概念、转移命题，或是言不及意、辞不达意，这样的辩论只会危害正道，而不会对人们有什么益处。他严正指出，类似这样的辩论，“衍不为也”！

从邹衍的一番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善辩的人。对公孙龙“白马非马”的

论题，他一眼就看出了症结所在，但并不道破，而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果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命题，而人们又有不同的认识或看法，那么，可以通过辩论来促进交流；如果命题本身就是假命题或伪命题，那只会混淆视听，惑人心志，这样的命题根本不值得一辩。如此一正一反，令人信服，于是在座的人都齐声叫好。辩论还没有开始，公孙龙就已经先输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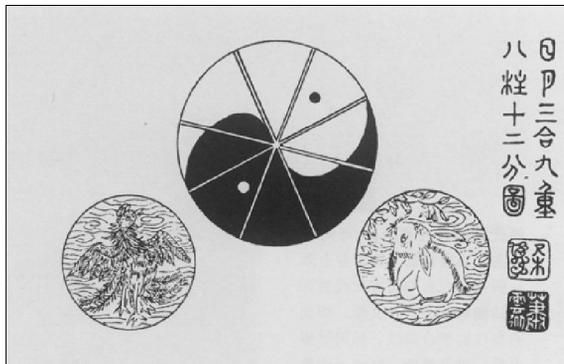
“衍不为也”，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宣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擅长辩论的人还怕论辩吗？非也。擅长辩论，也要看辩题有无价值，是否值得辩论。如果对方的辩题本身就是假命题或伪命题，你还去和他争论不休，岂不是自贬身份？邹衍还未和公孙龙进行正面交锋，就已经令公孙龙自觉理亏。

然而，早就有人指出，邹衍和公孙龙根本不是同时代人，怎么可能发生正面交锋呢？这同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但我们没必要拘泥于文献的考证，一定要搞清楚谁在前，谁在后，搞清楚二人究竟是不是同时代人。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只要明白一个事实就够了，那就是邹衍不仅是阴阳学说的开山祖师，还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不然的话，他何以能够在高手如林的战国时期出入各国，进退自如？何以能够受到如此之高的礼遇？

邹衍的著作虽然已经不存，但其阴阳思想却在其后的一些著作中时时可见，如秦朝吕不韦门人所著

《吕氏春秋》、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东汉班固等编撰的《白虎通义》等，都充斥着阴阳五行思想。迄于隋唐，萧吉《五行大义》和唐·吕才等编纂的《阴阳书》传世，阴阳五行思想才得以系统化。在阴阳家看来，万事万物都依据其所属阴阳五行的生克关系自然发生变化。譬如地球的自转形成昼夜，昼为阳，夜为阴；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形成寒暑，寒为阴，暑为阳。阳盛则衰，衰则阴继；阴盛则衰，衰则阳继，周而复始，以至无穷。阴阳家在解释万事万物的生成变化时，不仅依据阴阳的强弱盛衰的转化，而且依据阴阳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他们把万事万物分为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皆有阴阳，五行之间也存在着相生相克、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关系。阴阳五行之间的这种内在关系，决定了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

阴阳家对阴阳五行之间内在关系的界定，无疑属于先验性的，至于他们为何作出这样的界定，由于其著作早已不存，人们已无从推测。后人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解释。譬如阴阳，有人以为是“气”，阴气与阳气交相运行，其运行之理就是



清初画家萧云从《天问图》上部的阴阳符

“道”；再譬如五行，有人以为五行就是构成世界万物的五种元素，有人以为是金、木、水、火、土五星；有人以为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以一、二、三、四、五是五行之生数，六、七、八、九、十是五行之成数，生数与成数相对应，才有所谓五行。另有一种说法，数是由小到大，万物也是由小到大，水最微小为一，火是由一点点火星而逐渐变大为二，木形坚实为三，金属坚固为四，土最大为五。但不论怎样解释，都是试图为阴阳五行说寻找一个理论根据，毕竟它是一种曾经十分流行的学说，一种有深远影响的学说，况且这种学说毕竟早已失传。不论怎样解释，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都有可能成一家之言。

如今知道阴阳学说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作为一种“取合诸侯”的学说，阴阳学说也曾扬眉吐气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以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他对阴阳家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论：“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在他看来，阴阳家对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令的规定，都合乎自然规律，符合王者教化天下的需要。至于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则体现了天道运行的规律，必须顺应，必须遵从，不顺应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无法教化民众，无法振起纲纪。但他同时也指出了阴阳家的致命弱点所在，那就是忌讳太多，让人感到各种限制无所不在，一举一动都

会有所畏惧。这样就势必束缚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限制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阴阳家的地位有所下降，从六家之首降到十家的第三位。尽管如此，阴阳家的地位比法、墨、名、纵横、兵、农等家还是要重要得多。

阴阳五行说在战国以后广为流布，尤其是在阴阳五行演变成“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的末学之后，在民间获得了很大的市场，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一些人丢弃了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以教化世风、整饬世教的大旨，而是拘泥于细枝末节，专注于各种禁忌，“舍人事而任鬼神”，把阴阳五行学说变成了一种神乎其神的神秘之术，出现了许多依据阴阳五行推算各种宜忌的方术，一些江湖术士更是借此招摇撞骗，欺蒙无知。一种曾经是“取合诸侯”的学说和理论，最后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既是无奈，也是不幸。

阴阳家虽然曾经风云一时，但他们的著作一部也没有流传下来。很有意思的是，典籍的缺失不仅丝毫没有影响到阴阳学说的流行，相反，在民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可以看到阴阳五行思想的遗迹和影响，感受到阴阳五行思想所具有的魔力。它是那样地顽强，那样地无孔不入，以至于你在不知不觉中为之所感染，为之所影响。甚至于你不得不感慨，在这个为阴阳所包容的世界里，阴阳无所不在，无所不是阴阳！

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